

王智慧, 畅洁卓玛.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向度[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1): 47-58.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向度

——基于“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主题叙事的质性研究

王智慧^{1,2,3}, 畅洁卓玛^{2,3}

(1. 中国人民大学 体育部 北京 100872; 2.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3. 中国人民大学 体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 文中就新征程“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体育发展新目标, 以6位体育学与社会学领域的专家主题叙事为基础进行经验材料收集, 并在此基础上围绕该主题叙事进行质性研究, 试图借此讨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向度。研究认为, 对于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而言: ①以人为本是其理论理性, 其中, 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思想基础, 个体权利与集体权益的结合为关键保障, 调和个体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则是指导逻辑; ②自下而上新发展之路的开拓是其实践理性, 自下而上之路的内涵具体表现于, 体育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全民共享性、体育作为健康治理手段的基础性以及体育作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自主性; ③以文化作为推动发展深化的引擎是其实质理性, 体育文化动力的获取要从凝练体育记忆中的文化力量、发掘传统体育中的文化根本, 以及提升体育科技中的文化技术等3个角度着手。研究为体育强国元理论、事件团结机制、筑牢共同体意识和公民体育权益研究拓宽了讨论空间。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二十大; 体育强国; 体育治理; 体育权益; 共同体意识; 健康治理; 体育文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23)01-0047-12

DOI: 10.15877/j.cnki.nsic.20221207.001

1 背景与问题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以下简称“二十大”), 习近平对过去5年来的国家发展情况作了报告, 并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提出新的目标: “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具体到国家的体育事业, 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新时代大幕的开启为体育强国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探索出一条中国式体育现代化之路成为今后体育发展的关键目标。对此, 身处崭新的历史节点上, 需要思考如何才是一条中国式的体育现代化发展之路, 如何才能依照这样的发展路径加快体育强国建设。要认识这两个关键问题, 不仅需要明确这一目标实现所依据的理论逻辑, 也需要在总结体

育强国建设过往经验的基础上, 探索出符合此目标要求的新实践路径。

体育强国的思想基础与实践路径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议题。历史性地看, 既有相关研究的讨论从对于该战略的基本组成与任务的明确^[2-3]逐渐深入到对于其价值基础与理论逻辑的探索^[4-6], 其中, “人民性”^[7-9]是所共识的实践基础; 此后, 开始出现对大致实践路径的探索^[10-11], 并且开始分别讨论竞技体育^[12-13]与群众体育^[14-15]层面的实践方式。随着研究触角不断深入和具体, 学界对体育强国建设的解读也更加丰富, 武术等民族传统体育价值的开发^[16], 全民健身、文化自信以及举国体制等其他国家战略与体育强国建设间关系^[17-20], 以及体育强国中国模式的提出^[17]等, 对体育强国建设认知角度的

收稿日期: 2022-11-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资助(18AZD037); 本成果同时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支持。

第一作者: 王智慧(1979—), 男, 辽宁朝阳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身体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

细化,其实也隐含着视角的内在转向,即已经认识到体育强国内涵中的文化性、全民性与本土性,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界对国家体育事业发展战略解读的自觉性。

上述论题及其演变表明,学界一直在试图寻找体育强国建设与国家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共振基础,换言之,在顺应国家整体前进目标的基础上,逐渐将其他发展命题和现实环境引入体育强国中,从中探索出既能内在地实现体育强国建设,又能外在地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路径。就时间脉络而言,上述讨论主要产生于过去5年间,即十九大之后至今,从侧面体现着对体育强国内涵的解读与实践探索的动态性。如今,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体育强国面临着加快发展的要求,在这些既有研究智慧贡献的基础上思索能够满足这一新要求的思想基础与实践路径即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研究以南京体育学院《体育学研究》编辑部举办的“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体育强国建设创新论坛”为契机,结合笔者参加的“体育强国的理论基础与行动指南”圆桌议题,在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智慧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池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于显洋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导师米靖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万炳军教授以及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关博教授,共6位专家学者(下文表述中将依名中字母代替)发言文本的基础上,整合为围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主题叙事半结构性质的经验材料,并以“主位”和“客位”的双重视角进行质性研究。之所以这样处理原因在于,一方面,突破了以往主题叙事综述性质的束缚,挖掘材料(发言文本)背后的本质意义和价值属性;另一方面,针对主题论域展现了参与者、研究者在“共情、共景、共述”语境下呈现的多重视角,为进一步深入阐释研究主题提供本质思考。

2 以人为本: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之源

2.1 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

沿着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础性前提在于,必须明确谁来建设、为谁建设的问题。“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要

遵循的首要立场,这源于以人民性为本质属性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性理论,而国家体育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遵照这一本质性原则。“人民”一词既包含个体性,也包含群体性,新时代体育发展所依循的人民性基础同时指向这两个意涵。

“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有两种认知具有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对这两种符号意义的遵循就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第一种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引申到体育运动上就是奥林匹克所主张的对生命的超越,对一种公平与和谐的追求;第二种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团结,是一种指向物种间的团结。”(W20221126BJ)

就个体性内涵而言,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丰富人民生命体验的时代机遇。受到胡塞尔在《观念Ⅱ》中所引援的关于“触摸”的例子^[21],即身体因作为主体和对象的双重存在而区别于意识体验的独特性,梅洛—庞蒂进一步以肉身主题取代胡塞尔现象学传统中的意识主题来进行自己的现象学思考。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认为,“我的身体通过运动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空间”^[22],换言之,身体作为一种认知图式,为个体提供着认识世界的功能。在借由身体运动所开辟出的此空间中,个体的知觉意识、具身身体和外在世界实现了联动,这种联动产生的关键在于身体在运动中具有的一种朝向物体的能力,即身体意向性。梅洛—庞蒂主张,个体意识只有与身体结合并通过身体意向性的表达才有“出场”机会,才能获得对自我身体和外在世界的真实体验。当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具体推行时,人民至上的立场原点决定了其最为基本的实践思路将是进一步鼓励人民的体育参与,即发展动力源于民、各项资源用之于民,发展成果惠之于民,就此而言,体育强国建设于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中的个体而言,都是丰富生命体验的时代机遇。就竞技体育层面而言,运动员是在高、精、尖层面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力量,新时代的发展目标激励着他们通过不断提升自身运动能力来实现成绩进步,这一过程是运动员对自身身体和运动参与知识的再启蒙,是对自我认识的再纵深,在获得生命体验的同时实现对生命的超越。就群众体育层面而言,人民大众是在基础层面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有力支

持,体育参与对于个体群众而言,实际上也是一种认识自己的新方式,但与竞技体育中的个体不同的是,这是在横向上对自我身体感知与生命体验的方式的拓宽。因此,就不同体育类型的参与者而言,体育强国的加快建设其实都是一种对“运动中的身体”的时代呼唤,更重要的是,个体在对这种时代呼唤的回应中通过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身体图式建立自我意识、身体与外界的勾连,用身体运动感知自己的生命、认识外在的世界,进而逐渐实现个体内在意识与外在世界间的平衡。

就群体性内涵而言,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促进社会团结的有效推手。个体通过身体图式达成身体与外部的联结与平衡的过程中,身体是作为一种感性论的身体,然而,这种感性论的肉身不仅勾连着自我与外部世界,也打开个体理解他人体验的可能。梅洛—庞蒂将弗洛伊德对身体力比多(libido)解释为朝向自我和朝向对象的“欲力贯注”^[23]描述为“身体的移情”,这种移情能力正是感性论的身体能理解他人经验的基础,身体的移情使自我的身体与他人的身体在根本上处于一种身体间性的关系中,在此基础上,他人体验与自我体验的共同与融合成为可能^[24],并且这种身体间性构成了个体进行主体间性的交往基础。由此,体育参与中形成的个体主体间性实现了个体之间对彼此经验的理解,并随着体育活动参与的不断增多而逐渐凝聚成共同体意识。由此,可以将体育强国建设理解为基于体育参与实现社会整合和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机制——从人民的集体意义出发提出目标,通过人民个体对体育活动的身体参与,形成基于身体间性而形成的主体间性的经验理解,并不断对其整合,最终强化为人民的共同体意识,实现社会团结的增强。

2.2 个体权利与集体权益的结合是关键保障

个体体育参与的增加和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作为手段与目标的关系得以顺利运作的关键在于,前者蕴含个体权利与后者所追寻的集体权益要实现交互性平衡。对这种平衡关系的强调,不仅出于如上文所述对于作为理论基础的“人民性”所蕴含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内涵的认识,也是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目标演变至今所逐渐凸显的题中之义。

“为什么要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为什么要由‘大’到‘强’?其实由‘大’到‘强’,以及向加快体

育强国建设的转变是一个从过去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转向今天的自下而上的社群动员的过程,是整合宏观结构和制度与微观的个体行为的过程,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讲,是促进个体行为与宏观秩序良性运行的过程。体育强国,并不是某一个人强,而是要集体强,这是区别于过去的体育强国评价体系。就个体而言,是一种关于生命质量、生活方式、体育和身体认知启蒙和启示的过程,从实践理性的层面来讲,体育强国就构建了一个以体育为抓手来实现个体生命权利与集体利益有机结合的过程。”(W20221126BJ)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目标大致经历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再到“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以及“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过程,不同时期的发展主题其实体现着国家顶层设计对体育发展方式、体育的功能和价值的认识变迁。就实践理性而言,体育参与是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同时期体育发展目标中群众的体育参与也始终是被强调的关键,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往往表现为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金牌至上”观念使得各类体育资源优先倾向于竞技体育领域,体育成为提升国家地位的关键手段之一,彼时体育大国的内涵更多地指向竞技体育大国,这种“大”的实现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政策投入与制度支持,换言之,早期体育大国的建设更强调结构与制度上的优势。目前,在从“大”到“强”以及“加快发展”的动态性目标演变背后,体育发展的理论视角开始下沉,关注并鼓励基层大众的体育参与,这是“强”相较于“大”在内涵上的超越与深化,不仅要争取成为竞技体育强国,更要促进群众体育强国的转型。

首先,体育发展路径的双向互通。早期的“体育大国”更强调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其整体路径呈现为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依托特定的结构倾向和制度支持推动体育大国的实现。此后,随着“大”向“强”的目标转化,以及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战略性提出,成就了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在政策目标的整体掌舵之下,鼓励和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体育,如“全民健身”计划的提出及实施,逐渐将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引入日常的群众生活中,以践行体育强国的目标建设。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目

标的提出,更加强调自上而下的顶层政策引导和自下而上的群众主动参与两种路径要实现双向互通,从体育层面促进宏观秩序与微观个体行动间的良性互动。

其次,个体权利与集体利益的交互平衡是上述双向互通得以实现的基础保障。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人类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25],即利益是一切社会经济行动的基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作为更先进的劳动分工的结果,有机团结主导的社会中的个体反映着世界的不同侧面,最终达到:“一个社会群体的成员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人性,即构成一般人的特性”^[26],这种在涂尔干看来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并存在于每个社会个体身上的人性,正是现代社会中不断原子化的个体间能够保持紧密关联并维持社会稳定的根本性利益共识。然而,这种利益并非指向交往工具化和狭义的利益观,而是更高层次上对生命质量的关注,落实到具体的体育实践中,则表现为每个社会个体都享有体育参与的权利。因此,体育强国集体利益的实现必须要在尊重这一普遍人性,即满足每个社会个体的体育参与权利的前提下,将个体利益融入集体目标的实现过程,同时也要将集体利益的有效成果惠及于个体,以此实现个体与集体的良好互动,有效保障体育强国的加快建设。

2.3 调和个体与现代化的关系为指导逻辑

就理性层面而言,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目标的阶段性演变是以世界发展进程以及国家发展实际作为重要依据和条件。世界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脚步持续稳步加快,而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主体在于人,由此可见,国家发展目标的制定与实现是处理人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因实并因时地对这种关系做出调适甚至更新,以保证社会整体的稳定向前。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针对不同领域提出的要求是为了更加具体有效地服务于整体目标的达成,各领域的发展相应地发挥着社会镜像的作用,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新目标就是在体育层面实现对人与现代化关系的再认识。

“现代性伴随着整个文明的演绎过程,而现代化过程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不断更新。人作为发展的本质,现代化对人来说不仅是他从一个生物人走向文化人的过程,也是享有其所创造美好的物质和文化

成果,并推动美好生活进程的过程,建设体育强国的根本是体育发展的成果普惠于每个人,这关乎每个人的利益,关乎中国式现代化。”(W20221126BJ)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是晚发型现代化,20世纪末进行改革开放至今,几十年间我国努力迎头向前,获得时空压缩般的现代化发展成果,经济体量的显著增长、人民物质财富水平的持续提升。然而,在社会经济不断增长的背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也存在无法忽视地产生于人类内部以及人类与时代之间的双重病症。

第一,群体间的文化堕距。1923年,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在《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文化堕距”(culture lag)的概念,指的是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丛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因变迁速度存在差异,而致使各部分之间的发展错位和不平衡,并由此产生文化滞后等社会问题。其中,制度的变迁最快,其次是民俗、民德,价值观念的变迁最慢^[27]。尽管我国通过发展方式与制度的改变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经济腾飞,但人民的价值观念并不能随之实现迅速变迁。落实到体育层面,城乡之间、内陆与边疆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发展堕距,不仅体现在此处所言的思想观念中对体育价值与功能的认知上,也体现在发展资源的分配上,这种差异的存在正是对体育强国中“强”所蕴含“集体强”之内在要求的阻碍与挑战。因此,对于以加强建设体育强国为主要内涵的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目标而言,增补弱势地区发展条件,启蒙弱势群体的体育认知,逐渐弥合体育发展中的现实“堕距”,以此在体育层面处理好个体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二,风险社会中的生存危机。风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疾病”,在贝克面对全球化时代到来所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中,人类在生产 and 活动中改变了人与自然、与人类社会和他人以及与自身的某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反过来给人的存续和继续发展造成了制约甚至某些更为严重的困难和阻碍^[28]。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给人类带来一场关乎生存的危机,就个体层面而言,身体与生命骤然被暴露于疫疾风险中,将人类的思索推向对生命本身的再思考,一则是对健康体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二则是对生命脆弱性的强烈体会,关于生命的这两种认知在启蒙,并共同赋予了风险社会中的体

育必要性和功能性,而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目标正是对这种必要性与功能性的及时回应,换言之,要让体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生命教育的一种手段。

3 自下而上: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发展新路

上文关于理论逻辑的讨论中提到,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路径需要实现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自下而上的社群互动之间的双向互通,前者是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本质属性,而后者作为新时代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对中国体育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再开拓。

3.1 体育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全民共享性

自下而上的发展之路得以实践的首要前提在于保障人民群众体育参与基本权利的享有,即先在体育参与人数规模上实现向“强”发展的基本要求,进而推动整体前进。

“体育强国要民众强,每个人要把体育带在身边,这也是我对全民健身的思考。全民健身的建设是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但我经常说不能以社区(为基本单位),因为社区,尤其在疫情期间,基本都是封闭的,但这些设施是用老百姓的钱修建的,应该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地社区之间、城市之间的不同区域内(修建健身场所),而不要把它建在小区里或社区里,任何的边缘角落都可以搭建这种健身环境,这样才能保证让更多的人去使用。另外,体育强国还要少年强,全民健身路径应该转向主要为青少年尤其是儿童提供活动和娱乐场所,当下的全民健身的设施建设以社区为单位,但社区中是以老年人人居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建议以社区为全民健身建设的基本单位。”(Y20221126BJ)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体育现代化目标中,前者发展主要依托全民健身战略的不断推进。上述观点隐含以下两个关键指向:第一,体育参与权利的共享性是全民健身实践机制的起点与终点。全民健身计划提出的初衷在于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日常体育锻炼,此计划的实际表现是健身设施的普遍修建,而这一公共事业的发展资金所需得益于公民对纳税义务的遵守,因此,全民健身计划从逻辑上看是一种国家主导、建设资本取之于民、发展结果惠之于民的环形机制,群众体育参与权利的共享性

重合于这一机制的始末。第二,体育参与权利共享性实现的工具性基础在于健身场地与设施的合理性分配。群众体育参与权利的全民共享性程度最为直观的体现是群众日常生活中对公共健身设施的可及性程度,尽管当下相关设施建设以社区作为基本单位来执行,但这一规范性标准忽略了人口的日常流动性以及不同人群对相关设施的差异性需求,也就是说,健身设施的分布和建设与群众体育参与权利的真正共享之间存在着固定标准所无法到达的“最后一公里”,不仅表现在社区空间对社区内外群体的区隔,还表现在社区内对健身设施使用异质化需求的分配不均等。总之,公民体育参与权利共享性的真正实现还需从重新思考健身设施的基本建设单位、优化健身设施的分配方式,以及丰富健身设施类型等3个方面做出努力。

进而言之,群众体育参与权利的共享性还蕴含着互动的含义,即“享”的相互性。全民健身设施的公共性意味着每个人都有使用的权利,而这种均等性使用权利的实践也为个体带来与他人互动的可能,这种可能性既源于不同个体同处于某一健身空间时所形成的时空共在,也源于身体现象学所主张的由身体移情所构成的主体间性。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需要整合制度、情境与互动三个维度来实现,其中互动要素的内容之一为‘众’。‘众’是多元性的,一方面指向庞大的体育参与人数规模,另一方面指向个体的互动频次,我在这里实际上借用了迪尔凯姆所讲的社会动力密度,也就是不同活跃程度的人之间的交往频次。”(W20221126BJ)

由此,实现体育参与权利的全民共享性还需要体育参与中形成一定高密度的主体互动,其必要性表现在高密度的互动意味着互动状态的延续,这一过程中,个体间就体育参与、体育参与中的身体经验等话题的交流,有助于将这种互动状态的延续转变为体育参与行为的延续,进而有效促进体育参与权利全民共享性的真正实现,并切实地表现为一条通过社会个体间相互动员而自下而上地促进群众体育发展之路。

3.2 体育作为健康治理手段的基础性

从现实意义上来认识群众体育需要且能够实现全面发展的缘由,显然在于体育运动对身体健康的

积极意义。上述群众体育参与权利可实现全民共享性的有力根据,也正是在于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发展目标对群众体育发展提出的要求是出于对社会个体生命健康这一基础需求的考虑,是对群众基本生存利益的真正关切,同时也符合人民对于体育运动的价值与功能最基本的认知。然而,在体育能够促进身体健康的普遍且朴素的认知基础上,需要讨论其普遍性背后的深层内涵。

“体育休闲可以预防疾病,维持健康,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是丰富生活和产生幸福的源泉,只有身体好了,才能到处走,到处看,这也是体育强国建设中一个基础性的东西。”(W20221126XA)

“儿童青少年必然是我们体育强国建设的生力军,也是体育强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汇集者。如何让青少年体育在体育强国建设当中发挥其重要的支撑作用,关键在于使体育充分介入青少年的健康治理中。如今,儿童青少年面临的健康问题变得多元复杂,肥胖、近视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越来越普遍。体育如何在慢性病和文明病如此流行的这个时代,发挥其功能来治理青少年身体健康问题,成为体育强国建设过程当中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W20221126XA)

前文关于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理论逻辑的讨论中所提及的,作为这一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关键保障,即个体权利与集体权益的结合在体育作为健康治理手段的意义上获得了最为基础的具体立足点。这种基础性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体育是对生命权利享有的一种基础保障。从现实意义上来认识群众体育需要且能够实现全面发展的缘由,显然在于体育运动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一朴素意义。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发展目标对群众体育发展提出的要求是出于对社会个体生命健康这一基础需求的考虑,是对群众基本生存利益的真正关切,符合人民对于体育运动的价值与功能最基本的认知。然而,身体健康的需要背后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将“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概括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而如学者Y所言,以身体健康作为前提的“到处走、到处看”,以及对“美好生活”与“幸福”的体验与追求,正是马克思意义上

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以生命安全为基本内容的马克思生命权利观中,生命健康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组成。当人们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调节社会生产,并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通过自然规律的遵循来保障生命权利^[29],以此逐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时,就进入了“真正的自由王国”^[30],而体育参与正是从促进生命健康的层面对马克思生命权利观的有效践行,赋能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远大目标的尽快实现。马克思思想中的生命权利观也正是我国现代化建中要始终秉承“人民至上”与“生命至上”的理论根据,以群众体育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目标的重要组成也由此获得了内在的思想基础。

第二,体育是人类获得健康成长基础的有效助益。于社会群体内部而言,不同群体对于体育的参与程度、需求程度,以及体育参与的重要性程度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意味着以体育进行健康治理时更需要以差异化而非均等化为原则导向。具体而言,如学者J指出的,在这种差异化治理中,要重点关注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治理,这是提升体育健康治理效能的关键。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一个指向过程性的动词,是一个行动过程。”(W20221126BJ)

对于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这样一个长时段的过程性目标而言,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是其必要基础,此动力来源的唯一依靠在于儿童青少年,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力量,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是其在未来投身社会建设的关键保障。因此,当下体育发展的行动理性在于,推动体育在儿童青少年生活中的普及,树立新的体育价值观,呵护好民族复兴伟业的基础力量。

3.3 体育作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自主性

第一,对于自下而上的新发展之路而言,上述保障体育参与权利的全民共享可以看作外在的结构性支持,而体育健康治理作用的基础性与“人民至上”发展总原则之间的共振则是内在的理论性基础,二者相对而言均呈现为静态性的实践路径。然而,此新发展路径能行得通且行之有效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于动态的自主性。

“体育强国要融入强,要形成基于体育场所的生态链,促进不同体育项目参与者之间,以及体育与其

他社交活动的相互与融合。很多地方建足球运动场一下建十几块,我认为不能这么建,应该把足球场与篮球场、排球场等其他运动场地交叉在一起去建,不要只建一类,不同运动的参与者之间可以相互学习,拓展体育参与的丰富性,并且任何一个场地其实不仅仅是运动场,其他方面都可以融入,比如亲子活动、商业休闲、教育空间,等等。”(Y20221126BJ)

“体育强国一定要鼓励、推动那些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和趣味性的体育活动,一定要学会玩,很多东西要真想变得流行和普遍,必须要玩。”(Y20221126BJ)

实际上,自下而上之路的“新”不仅是整体发展路径的再拓展,其中要蕴含着对体育参与的认知转向,这是人的自主性的第一个内容。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为主的体育发展形态中,各项资源对竞技体育的倾向使得群众对体育参与的认知相对而言更多地表现为将其作为一种专业技能和为国添彩的事业,于普通群众而言体育参与的日常性不足。然而,随着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等战略的引导,以及风险社会中人们对于生命认知的不断启蒙,人们逐渐主动走向体育运动,缩短它与日常生活间的距离,并从生活方式与休闲娱乐的角度理解体育参与,这种认知的转向本身就是个体自主思维动力的体现。

第二,体育空间中的交往自主性。学者Y所提到的不同类型体育场地的混合修建以及体育空间功用的多元化建设,指向哈贝马斯意义上的交往型公共领域的建构。在始于哈贝马斯的当代公共领域理论的交往转向中,公共领域被看作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即意见的交往网络,这种交往勾连于其参与个体的私人生活,实现简单互动的空间结构的扩大化和抽象化^[31]。公共的体育场所是一种典型的公共领域,依托于此可实现的交往自主性可以从聚集其中的公众所具有的3个特征来认识^[31]。首先,就开放而言,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不似福柯意义上的那般具有排他性,在哈贝马斯这里,简单随意的相遇是空间结构形成的基础,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人们能在周遭公众的多重声音中听到种种生活史经历的回声^[32]。由此,体育公共空间中不同体育项目参与者之间,体育参与者与非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甚至非体育参与者之间的停留对于体育参与经验与认

知的交流、体育项目的普及以及非体育参与者体育知识的启蒙而言,都发挥着一种基础性的动员作用。其次,就平等而言,交往型公共空间强调公众的非专业性,意味着此类空间中的交往行动是基于日常化的语言,而摒弃了专业语言和特殊代码的使用,这便从话语交流这一基本互动形式上保证个体间的平等。这种平等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不同个体在体育参与知识上的“文化堕距”(culture lag),而更加强调个体与体育关系上的平等性,突出人与身体活动间的纯粹关系,为群众体育的发展去除了部分文化结构性障碍。最后,就理性而言,交往行动者个体根据对交往对象自由的承认,构成一种主体间共享的言语情境空间。在一个复合型的体育场所中,不同体育运动的参与者、商业从事者、亲子活动的享受者以及户外教育活动的参与者相遇于共享性的情境空间中,每一方都在这种混融状态中接收并实现对其他多方行动者所传达信息的自主理解。由此便实现了学者Y所言:基于体育场所而形成的生态链,将体育根植于日常的社会交往当中。

第三,体育参与心态上的自主性。人们常以体育行为中的具身动作表达日常的体育参与,比如踢足球、打羽毛球、跳绳等,这其实是一种通过强调具体的身体动作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体育参与心态的暗示性引导,如某些个体对于跑、跳等剧烈动作的抗拒可能会导致其对相关运动项目甚至对体育本身产生排斥。那么,若能“学会玩”,即改变体育参与心态,摒弃身体动作的规定性对参与心态的影响,转而以最朴素原始的“玩”的心态来替代,以此主动寻求体育运动的玩乐之趣,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自己“玩”的能力。本质而言,这种心态上的自主转向,是个体从被引导状态下对生命权利的中立性行使到对生命权利主动享有和探索的微观转变,但此微观转变于群众体育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而言或许蕴含着获益其中的可能。

4 文化为实: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深化之擎

关于体育强国内涵的认识,文化性是多位学者所共同强调的要素之一。如果说以人为本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理论理性,自下而上新发展之路的开拓则是其实践理性,那么,为众人所共识的文化性内涵则可以理解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实质

理性。

4.1 提炼体育记忆中的文化力量

学者C鲜明地指出中国体育目前发展中文化性的缺乏,其所指称的文化并非狭义的知识性文化,而是抽象的能为整个中华体育发展所用的精神力量,对此,学者C认为可以从运动员的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中挖掘体育的文化性力量。

“体育现在缺少文化,这个文化我认为是一种传承,就是说不光要自己能感受到,而且还能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比如说,奥运冠军的体育人生回忆就是我国体育事业的一种重要财富,从他们身上采集的那些一手信息不仅是对中国体育记忆的保存,还对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承中华体育文化,推动运动项目文化建设,丰富奥运文化等有着重要的意义。”(C20221126BJ)

“体育明星、奥运明星们所倡导的体育文化及其文化品位,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引导着整个社会的体育潮流和体育文化风向。”(W20221126BJ)

奥运冠军和体育明星既是承载体育记忆的载体,同时也是基于交往和文化记忆而建立起来的价值认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挖掘体育记忆背后的核心机制并夯实体育文化的认同和传递意识,就构成了体育文化深化发展的目标引领和动力基础。以奥运冠军的体育记忆作为材料从中挖掘能为社会所认同的和接受的体育文化性力量的基础在于奥运明星身上所具有的“卡里斯马权威”,这是基于运动员高水平竞技能力而形成的权威。结合两位学者的观念,将奥运冠军的体育记忆中转化成能够“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承中华体育文化,推动运动项目文化建设,丰富奥运文化”的这种强大力量的逻辑过程实际上主要由两种活力之“物”的转化过程所组成,并且两种转化间存在顺序性——作为活力之“物”的奥运金牌向奥运冠军“卡里斯马权威”的第一种转化,作为活力之“物”的奥运记忆向体育文化力量的第二种转化。

“活力之物”(vibrant matter)的概念在贝内特关于政治生态学的论述中提出,认为物不一定是消极、被动和顽固的,而是为人所操控的和可预料的^[33],并因此成为构成人类社会关系、文化与结构的中介^[34]。物质性研究就是要把非人的物纳入社会分析的视域中,发现人、非人的物以及环境中的交互作

用^[35]。由此,在第一种活力之物的转化中,奥运金牌作为物的活力在颁发给冠军的那一刻被激活,成为表征着冠军竞技能力的符号标签,在奥运颁奖礼的一系列仪式性活动的操持下,冠军与金牌一同在群体中形成了具有区别化和差异化的等级意识^[36]。

就运动员层面而言,金牌的活力使冠军运动员成为同类群体中的模范,而就整个社会而言,在金牌加持下运动员成为为国争光的国家英雄,并将运动员的冠军形象在大众心中具象为高超的运动能力、坚韧不拔的意志、刻苦拼搏的精神等无形的精神象征,而正是这些象征性力量就是从奥运冠军的体育记忆中挖掘出的文化力量。第二种转化与第一种存在活力之物的本质发生改变,这一种转化是奥运冠军的体育记忆转化成中华体育精神,其中,“物”是奥运冠军们被采集的体育记忆,与奥运金牌这一由特定质料所制成的具体的物不同的是,这种“物”是一种抽象的无形之物。然而,既有的关于物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物,如垃圾^[35]、墨水^[37]、宗教艺术品^[38]以及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中经典的礼物议题。关于抽象之物的物质性仍然有待学界进一步讨论。

尽管关于第二种转化,即记忆作为一种抽象之物,其物质活力的能动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探索,但上述两种转化过程的前后结合,在理论上的确能够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贡献自己的文化力量——中国奥运冠军的体育记忆不仅是对世界奥运记忆贡献中国回忆,也是中国对自己奥运史的动态记录和文化认同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些记忆的回顾是对中国如何从当初发出“奥运三问”的无奈到今日迈向“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自信这一艰辛历程的反思与总结。

4.2 发掘传统体育中的文化资本

不同于学者C将中国体育缺少的文化内涵理解为可传承的文化记忆,学者G强调从具体传统体育中寻找中国体育的文化资本。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对传统文化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时代路径,这一路径的关键在于明确如何创造与创新的问题,其本质在于选择,即在全面认识传统文化本质与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传统文化中与当下发展目标及社会现实相契合的内容做进一步转化与发展。

“体育强国是中国引领世界体育潮流的时代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组成,但是我们国家的哪些运动项目是能够真正引领世界体育潮流的呢?未来,在体育强国的建设道路中,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其独特作用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也是现实且严肃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方面思考这个问题。”(G20221126CC)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讲好中国故事”就是对文化资本的赓续和符号化表达,文化资本的赓续就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基因认同基础上的文化继替过程。文化经由人的创造,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特征,在马克思对于文化本质的认识中,他将文化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的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那样在精神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9]文化本质的不同决定了群体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我国作为多民族的国家,拥有丰富多元的民族体育文化,这种丰富性正是来源于不同民族间具有差异化的文化本质。

面对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新目标,如何从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中取时代之所需,应时代之所求,需要同时着眼于“快”与“强”这两个发展关键,挖掘民族传统体育的根本性文化力量。“快”对于具体实践的要求在于加快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文化价值的认识与甄别。这一则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尽早保护,以免失传,二则是从中尽快发掘能对当下体育发展提供助益的内容。“快”的这第一层实践方向在体育发展方面有着积极意义,也是对文化自觉的积极回应以及对文化自信的实现提供助推。

“强”的意涵则可以对应到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上。首先,创造性转化方面的目标更多地强调在体育层面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良性互动,具体而言,从实践形式、运动技能以及传授方式等方面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相应调整,以此将其以运动项目的形式推入现代人的体育参与中,但这只是其创造性转化在表层上的

实践路径。传统与现代的这种融合,其本质并非现代体育对传统体育的接纳与吸收,而是两种意识的碰撞。就文化的意义而言,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源自先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结果,凝聚着先民的集体智慧,是涂尔干意义上集体意识的具体化表达,此外,并且其“体育”属性本身也是现代意识对它的认知再造。对传统体育进行创造性转化以助益现代体育发展,是现代性集体意识对传统性集体意识的现代性改造,亦可以理解为是传统集体意识对现代集体意识的反哺。因此,民族传统体育在深层次上的创造性转化实践就是发现传统集体意识中关于体育认知的精华所在并为今之所用,具体可以从体育价值与功能的认识、体育运动中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甚至对体育概念本身的认知等方面进行思想挖掘,总之,这些本质性的文化要素才是保证中国在体育发展上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的根本所在。其次,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其实践层次依旧包括表层的身体运动和深层的文化内涵两个方面,不过,表现形式与实践终点要突破体育层面,指向更宏观的发展目标,以深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换言之,如学者G所言,以“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走出”的方式将民族传统体育的深层价值观念与文化内涵作为中国故事的优良素材,丰富故事叙述的层次与内涵。

4.3 提升体育科技中的文化技术

于世界疫疾危机中顺利举办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中国运动员在此届冬奥会实现运动成绩突破性进步的背后,是涵盖办赛、观赛、训练、竞赛、参赛、安全保障方面科技力量的支撑。在主题叙事中,学者M多次强调我国对上述领域中多项科技的自主研发。

“体育科技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的关键。北京冬奥会实现了双奥之城,其实这也是体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标志。为了备战北京冬奥会,我们的一些科研院所自主研发了许多训练设备,比如练习速度滑冰弯道技术的助滑设备、全世界最先进的风洞、改善运动员疲劳程度的金融电刺激设备,还有运动员的比赛服装、分钟级的天气预报、中国首台双人雪橇,等等。”(M20221126BJ)

体育科技的同样是体育强国的内在维度之一,但它对于体育发展的辅助性地位决定了体育科技发

展必须通过对体育参与者运动表现的改善来彰显,而体育参与在本质上是一项人类文化实践,由此,科技助力体育的内在本质体现为文化技术的实践过程。文化技术的概念源于德国的文化与媒介研究传统^[40],后经过基德勒的发展,成为串联起行为者(actors)、器物(artifacts)和技术(techniques)三者之间形成操作链的一种机制,着眼于以多元文化立场与人文主义视角考察身体、技术实践对韦伯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之网”的构建机制与作用生成,以此凸显文化的具身化、可感知性、物质性与操作性^[38],基于这种操作链的认知体系,文化技术认为人不是工具的中心或源起点,而是这一操作链的结果^[42],这就重新“发现”了文化实践中被遮蔽的技术维度^[41]。在文化技术的理论视域下,体育助力科技的机制由两种操作链所组成,其一,是科研人员—研发工具—研发人员的工具使用技术和对科技知识的运用所形成的“体育科技研发操作链”;其二,则是运动员—科研成果—运动员使用科研成果进行训练的身体技术所形成的“体育科技使用操作链”,前者的技术结果是后者的必要组成,体育科技作为体育强国的重要组成,其价值需要运动员成绩的提升为中介才能得以体现的机制性解释。

就科研人员—研发工具—研发人员的工具使用技术和对科技知识的运用技术组成的“体育科技研发操作链”而言,首先,要保证有稳定的科研人才输入,这需要科研院所承担起人才吸引与培养的任务;其次,是有全整的研发设备与器材,这不仅需要把握国际相关发展的前沿动态,更需要相应资金的持续性投入;第三,专业人才对科研知识与技能的不断汲取与提升,同样需要依靠人才与科研院所间的互动,保证专业知识的流动,此外,也要在专业人才培养中注重实践能力的训练。由此,在科研环节,体育科技的进步需要依靠三者的同频提升及三者间的积极互动。就运动员—科研成果—运动员使用科研成果进行训练的身体技术所构成的“体育科技使用操作链”而言,体育科技的成果要逐渐普惠于对其有需求的竞技体育训练中,这也是竞技体育层面科研成果享用的“全民性”实践,同时,要提升科研层面的理论成果向实战成绩的有效转化,转化效率的可靠性可以通过训练中增加科研成果的使用次数,即通过多次的训练试验进行检验,以保证科技助

力的可靠与稳定。

总体而言,通过提升体育科技中的文化技术促进竞技体育对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呼应,需要从科研人员、研发工具、研发人员的知识能力三者同频提升,体育科技研究成果向实战运动成绩的转化效率提升,以及体育科技成果在竞技体育中使用率的提升三个方面着手,在保证两种操作链条有效持久地运转上,不断深化体育科技力量对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助力。

5 结语

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也迎来新的契机与挑战,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对体育事业发展所遵循的理论基础与所要走向的实践路径做一番深入清晰的思考十分必要,这不仅是对既有体育发展状态的简要回望与总结,更是对接下来发展方向的具体标定。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走向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因而对于前者的讨论及从中获得的认识对于后者总体目标的实现理应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沿着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实质理性的逻辑,通过对“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议题的讨论和分析来剖析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人民至上原则依然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最为核心且首要的理论理性,在这一前提之下,需要在既有的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路径之外扩展出自下而上的人民自主动员、自主参与的新路径,充分鼓励体育参与权利的全民共享,挖掘内涵于体育中的健康治理之能,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引导体育成为一种生活与生命体验的方式,这便是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实践理性^[42]。然而,要实现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过程性和持续性要求,需要以文化作为引擎,从体育记忆、传统体育、体育科技等3个方面挖掘和获取保证持续性前进的实质力量,即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发展所需要遵循的实质理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2-2)[2022-10-25].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2] 黄莉. 体育强国的理论框架与顶层设计——从“十九大”报告中的国家大战略思考体育发展战略[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 41(1): 9-16.
- [3] 鲍明晓, 邱雪, 吴卅, 等. 关于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体育发展全局的战略性问题[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8, 41(2): 1-6.
- [4] 周学政, 许晴, 谢晓东. 新时代体育强国之路的思想基础与战略选择[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9, 42(9): 1-9.
- [5] 邢金明, 王松, 刘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思想的学理逻辑、理论特征与价值挖掘论纲[J]. 体育与科学, 2021, 42(4): 8-14.
- [6] 郭维刚. 论共享发展理念与体育强国的价值建构[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7(2): 78-83.
- [7] 柳鸣毅, 曾洪涛, 敬艳, 等. 体育强国建设的人民性[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7(6): 718-724.
- [8] 彭国强, 高庆勇. 新阶段竞技体育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机遇与战略路径[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7(5): 518-524.
- [9] 蒋菠, 向金波, 文艳红, 等. 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实施的视野与路径[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0, 43(4): 11-17.
- [10] 钟秉枢. 新型举国体制: 体育强国建设之保障[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5(3): 1-7.
- [11] 祖雅桐, 董传升. 逻辑内生与外展: 新时代体育强国治理方式探微[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0(3): 115-121.
- [12] 白银龙, 舒盛芳, 许海峰, 等. 世界竞技体育强国运动员保障经验及启示[J]. 体育文化导刊, 2021(1): 81-87.
- [13] 彭国强, 杨国庆. 世界竞技体育强国重点项目奥运备战举措及对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启示[J]. 体育科学, 2020, 40(2): 3-14.
- [14] 李崑. 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体育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国逻辑与路径[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6(1): 41-51.
- [15] 周惠新, 欧玉珠, 雷强. 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强国建设: 思想·内涵·路径——《体育与科学》“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体育强国建设”学术工作坊综述[J]. 体育与科学, 2022, 43(6): 1-8.
- [16] 王树粤, 李贵艳, 王岗. 中国武术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及促进策略[J]. 体育文化导刊, 2021(1): 21-27.
- [17] 崔乐泉. 中国式现代化与体育强国建设的中国模式[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4(06): 592-601.
- [18] 孙楚, 谢慧松, 厉素霞, 等. 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体育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J]. 体育文化导刊, 2021(5): 28-34.
- [19] 陈尚伟, 刘原, 孙晓华, 等. 习近平关于体育强国重要论述的价值特性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6(3): 265-273.
- [20] 袁凌峰. “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我国省级体育公共财政投入效益研究[J]. 体育科学, 2022, 42(5): 38-46.
- [21] HUSSERL, EDMUND.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Second Book. Studie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Constitution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 [22] MERLEAU-PONTY, MAURICE. Phenome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M]. Paris: Gallimard, 1945.
- [23] FREUD, SIGMUND. On Narcissism: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Karnac Books, 2012.
- [24] MERLEAU-PONTY, MAURICE, LA NATURE. Notes, Cours du College de France [M]. Paris: Seuil, 1995.
-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26] 埃米尔·迪尔凯姆. 迪尔凯姆论宗教 [M]. 周秋良,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 [27]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28] 王赟, 程薇瑾. 从贝克到吉登斯: 风险社会理论中的认识论差异[J]. 社会科学研究, 2022(3): 145-153.
- [29] 方世南, 戴明新. 论习近平“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理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3(5): 1-9.
- [3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1] 谢安民.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交往转向及当下意义[J].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 2021(6): 54-62.
- [32] 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 [M]. 童世骏,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 [33]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4] APPADURAI. Mediants, Materiality, Normativity [J]. Public Culture, 2015, 27(2).
- [35] 张劼颖. 垃圾作为活力之物——物质性视角下的废弃物研究[J]. 社会研究, 2021, 36(2): 204-224.
- [36] 王智慧. 文化继替: 体育文化记忆的现代性社会理论解释(定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37] 罗士洞. 物的社会生命: 徽墨的社会史研究——基于个案的历史分析[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4): 67-73.
- [38] 刘冬梅. 汉藏文化交流史中的艺术品及其象征意义: 一件织锦唐卡的历史语境转换[J]. 民族研究, 2021(2): 122-136.
- [39]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 [40] WINTHROP, YOUNG G. Cultural Techniques: Preliminary Remarks [J].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3, 30(6): 3-19.
- [41] 刘永强, 吴宏宇. 文化技术理论: 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身体、物质与符号[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1, 32(4): 76-90.
- [42] 王继周. 文化技艺: 德国文化与媒介研究前言——对话媒介哲学家杰弗里·温斯洛普·扬[J]. 国际新闻界, 2020(5): 51-60.
- [43] 王智慧. 如何再续“冰雪奇缘”? ——北京冬奥会后期效应与东北冰雪产业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路径[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2, 56(5): 29-38.

作者贡献声明:

王智慧: 提出论文选题, 设计论文框架与思路, 撰

写论文, 审核、指导并修改论文; 昉洁卓玛: 收集处理

材料, 撰写论文。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for Chinese Sports Moderniza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Narrative of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WANG Zhihui^{1,2,3}, YANG Jiezuoma^{2,3}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Research Center for Sport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Guided by the objective of “moving faster to build China into a country strong in sports” on the new journey, a qualita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its thematic narrative, with a basis on a semi-constructed interview with six experts in sociology and sport. In so doing, it is intended to figure out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for the Chinese path to sport modernization. And we thought that for the goal of Chinese sport modernization, firstly, people-centred approach is the theoretical rationality,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at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s the very basis, while the combina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and collective interests is the key requisite and its practical logic is about to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odernization. Then, the new bottom-up development road is practical rationality, and its connotation is manifested by the sharing of sports as citizens’ basic rights, the foundation of sports as a means of health governance, and the autonomy of sports as a modern way of life. And finally, taking culture as the engine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s its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The acquisition of sports cultural power should start from three aspects: refining the cultural power in sports memory, exploring the cultural roots in traditional sports, and improving the cultural technology in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expands the discussion for the study of meta-theory of leading sporting nations, event solidarity mechanism, community awareness and citizens’ sports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sport governance; sport right; sense of community, health governance; sport culture